



红安 两百将领传

第一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红安两百将领传

(第一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安两百将领传/《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
ISBN 7-5073-0997-5

I.红… II.中… III.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生平事迹—红安县 ②革命烈士—生平事迹—红安县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235 号

红安两百将领传(第一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编 100017)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40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6000 册

ISBN 7-5073-0997-5/K·464

两卷 定价 59.00 元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

顾 问 彭定国 耿协楠 徐觉先

主 任 林全华

副主任 梅祖怀 曹汝清 杜章均 陈远均
杨家斌 李大月 吴光德 王 玲
彭希林

主 编 鼓希林

本卷主要撰稿人(单位) 李先念传记组

董必武传记组(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诚 王东波 刘光明 李德义
辛向阳 孟晓慧 姜庆肇 周念念
郭丽卿 秦 华 彭希林 熊建国
霍燕平

前言

红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第一县。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几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锡联、秦基伟、韩先楚、王建安、周纯全、郭天民、王诚汉、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徐深吉、徐斌洲、詹才芳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数万名红安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先后应征入伍,戍边卫国,其中吴晓恒(女)、黄俊峰、胡先贵、江建曾、罗毅、秦卫江、李平、刘晓琨等同志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国新一代将军。

为了让当代青年更好地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开国将领们的光辉业绩,学习革命前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思想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并从新一代将军的成长经历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中央、省、市党史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 and 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红安县委、红安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以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主任的《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由县委党史办公室兼),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红安两百将领传》,奉献给广大读者。

衷心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将为《红安两百将领传》题词。

《红安两百将领传》立传对象为:红安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安籍军官;战争年代曾在人民军队中从事军政领导工作,建国后担任副军(副省、副部)级以上

职务,或享受副军(副省、副部)级以上待遇的红安籍高级干部;战争年代牺牲的副师(副地)级以上红安籍革命烈士。全书拟分五卷六册和若干本专辑,陆续编辑出版。第一卷由“特别篇”和“上将篇”组成,出一册;第二卷为“中将篇”,出一册;第三卷为“少将篇”,出上、下两册;第四卷为“高级干部篇”,出一册;第五卷为“英烈篇”,出一册;专辑为“新一代红安籍将军”,暂不定册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一、红安,原名黄安,1931年12月第一次改名为红安。一年后,其西部二程区、西北部仙居区各一部分划归新设置的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北部紫云区一部分划入新建的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所划出的地方均是当时红安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刘华清、吴先恩、高厚良、吴世安、吴林焕等数十名开国将领和著名军事家、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烈士等,就是从这些地方走出来的。他们本是红安人,红安人民将永远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但鉴于大悟、新县也在为他们立传,也在编撰类似书稿,为了尊重邻县人民对老将军的感情,根据行政区划的现状,这些将军及相关人物的传记,暂不编入本书。

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是编撰人物传记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人物传记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始终遵循这条原则,力求所有传记资料准确可靠。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人物资料来源单一,加之编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某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我们热忱欢迎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供有关资料,以便今后再版时补充、订正。

三、受资料限制,本书传稿篇幅(字数)以编者所掌握资料的多寡而定,并非其它。

四、除第一卷“特别篇”外,各卷(册)传记的编排均以传主姓氏笔划为序。

编 者

2001年3月19日

目 录

前 言	1
-----------	---

特 别 篇

董必武	1
李先念	71
郑位三	157

上 将 篇

王建安	181
王诚汉	237
陈锡联	277
周纯全	337
郭天民	371

秦基伟	407
韩先楚	449
谢富治	489
后 记	507



董必武

董 必 武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了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斋，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诞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董基文在兄弟8人中排行第三，与老四董其明先后考中秀才，两人均在黄安、麻城一带以教塾学为业。董基文为人正直，鄙视趋炎附势，足不涉公门，在当地有耿直之名。董必武的母亲蔡氏，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劳动妇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的生计，主要靠父亲、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父、二伯父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所得的一些钱来维持。家中虽然人口众多，但上辈兄弟和下辈兄弟间都能互谅互让，和睦相处。

董必武小时，常跟父亲到塾学去。5岁那年，父亲在县城广善庵教书，学生中有背不出或背不全《三字经》者，他常在窗外朗声代答，且一字不差。父亲惊喜他聪明好学，就让他跟读。9岁，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10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湾读书。此前，离张杰湾不远的宋埠镇，发生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所谓“宋埠教案”。这事

是因为外国传教士欺侮中国妇女引起的。当地人民愤然烧毁了教堂,打死了传教士。事情发生后,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赔款白银4.2万两,答应重修教堂,并把两位农民带头人判刑投狱,许多人受到责打。当地人民愤愤不平,就把这事编成了花鼓戏、皮影戏到外演唱,歌颂两位农民领袖的勇敢机智和民族气节。董必武看过这些演出后,在他幼小心灵中产生了对横行霸道的传教士的强烈憎恨和对农民英雄的无比崇敬。

以后,董必武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在此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友借阅了不少演义小说和历史著作,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已能写一手文字通达的文章,几次参加县的“观风”(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士子,称为“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

董必武的学业日益长进,父亲,四叔及家里其他人都希望他考得功名,改变家庭的贫困境况。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应试,中了秀才。按照当地习俗,中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他却故意绕道回了家。

同年秋天,武昌新办的武普通中学堂招生。董必武想弃文习武,便前去报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城,各种事物他都很感新鲜。一次路过抚台衙门,他好奇地走近探视,还未走到门前,就被卫兵抓起来痛打一顿,使他怒火满腔。接着,在武普通中学堂参加口试时,因他长得黑瘦,又穿着父亲一件旧长衫,显得老气些,被老官认为“年岁太大”,未予考取,遂怀着对清朝官吏的仇恨心情离开了武昌。

返回家乡后,董必武开始在黄安城内一所高等小学校任教。由于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加上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使他不能安心把书教下去。1905年春,他放下教鞭,再次来到武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文普通中学堂。因学堂下半年才开学,他就与另两位

同学一起在武昌司衙巷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自学。这期间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成了他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

日知会的司理刘静庵，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该所被清政府封闭，就隐藏在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名义，广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并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主张。武汉的革命党人和关心革命的仁人志士，一时纷纷云集这里，痛贬时弊，抨击朝政。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的报刊和新书，眼界大为开阔。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名声很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当他看到康有为提供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主张，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的文笔流畅、富有感情所吸引，一时成为这些著作和报刊的热心读者。

1905年10月，董必武正式进入文普通中学堂。他学习刻苦努力，因原来文史基础较好，得以较多精力攻读英文及数理学科，考试成绩总列第一，受到该校监督（即校长）纪矩伟的赞赏。这个学校在当时也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阵地之一，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都是该校学生。董必武与这些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他虽未加入秘密的革命团体，却赞成他们的思想，同情他们的活动。董必武入文普通中学堂后，仍利用课余时间，去日知会阅读新报刊及一切能见到的秘密印刷品，思考研究当时纷纭的革命主张。刘静庵见他是个有作为的朴实青年，主动给他介绍和提供图书，指导阅读，其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给他思想以深刻影响。董必武把刘静庵看做是自己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师益友。后来，刘静庵被捕，虽遭酷刑拷打，数次昏死，仍坚贞不屈，醒后继续痛骂清朝官吏不止，慷慨就义，被人们誉为“铁汉”。这一高大形象，长久深印在董必武的记忆之中。

正在这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在日本创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接着,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06年4月《民报》第三号专门出了号外,列举两派分歧的根本问题,对改良派展开了全面讨伐。董必武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两派的纲领和主张。经过反复对比,他认识到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而孙中山主张采取革命手段,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还政于民,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自然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的先进的纲领。于是,他毅然摒弃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了。

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进入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想把文普通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是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优,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斧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监督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初步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在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纪矩伟和学校的教师都很器重他,希望他继续深造。但他“家无担食之粟,野无附廓之田,食指几三十人,仅赖家大人与季父笔耕以度日……”无力供养他继续求学。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他应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陈逵九的邀请,到该校任英文教员去了。

二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正在黄州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即赶赴武昌。当他到达武昌时,武汉三镇已被起义部队占领,他参加到军政府军委部担任秘书工作。这时,清军正在调集大量部队向汉口反攻。10月16日以后,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董必武从武昌奔赴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他精神振奋,在前线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10月下旬,因为清军援军不断增加,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孤城,陷于险境。他又积极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援和响应,终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

11月29日,武昌军政府改组,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一起转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在此期间,董必武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参予了重建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工作,并在11月间被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1912年初,他被派赴黄冈为军政府筹款。完成任务返汉后,武昌军政府改为湖北省军政府,他被任命为省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科长。

1913年1月,董必武离开财务司,先后到宜昌川盐局和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任职。同年夏天,孙中山回国策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他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组织队伍,准备响应。但是,“二

次革命”在江西、南京、广东等主要地区刚刚发动，就遭到袁世凯的镇压而失败。黎元洪借机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不能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1914年1月，他得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大学学习期间，孙中山正亡命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丧失信心，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数百人。董必武深感国民党散漫不统一的弊病，非常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他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中。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5月，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实现他做皇帝的美梦，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国内反日反袁的声浪迅速高涨起来。6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国，路经上海时与潘怡如等取得联系，准备回湖北在部队中策动反袁的军事行动。

当时驻守武昌南湖的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同乡和旧友。他们到武汉后，就与李愈友等秘密联络同志，策动起事；同时致函辛亥革命时的旧友姚汝婴，希望共同努力。但因布置不周，起事计划泄露，他们的处境异常危险，不得不暂时潜回黄安老家。

董必武与张国恩回黄安不久，被叛徒告密。张国恩乘隙走脱；

董必武被黄安县反动知县逮捕入狱,后来由于陈逵九等人上下疏通,三个月后,得以保释回家,但仍受反动当局严密监视,不准出城。同年12月,袁世凯为加紧防范革命党人反对他称帝,命令各地爪牙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安的反动知县接到密令,再次将董必武与张国恩逮捕,监禁在黄安监狱。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也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黎元洪接任总统后,宣布恢复国会,承认临时约法,各省议会也都要恢复,内务部还通报各省凡在袁世凯当权时因政治关系取消议员资格者都一律恢复。董必武这时出了狱。他到武汉与许多革命党人联系,为詹大悲(原湖北省议员,也因反袁入狱刚刚获释)当选议长进行了大量活动。但因湖北督军王占元以詹的议员资格系由议会除名的,不同意恢复,于是詹大悲的议长当选了,而议员资格还没有恢复,以一场滑稽戏而告结束。

1917年2月1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在此期间,他开始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毕业返国后,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他们因承办的第一个案件处理迅速而又获得胜诉,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声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了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自川返鄂于次年三月抵鄂西,应驻防利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约任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驻在川鄂边界的靖国军黎天才、唐克明部,早有争夺鄂西地盘、吞并蔡济民部队的野心,只因蔡济民的地位和声誉,才使他们不敢轻易下手。1919年1月27日夜,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不备,袭击蔡部并将蔡枪杀。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

款的董必武闻讯赶了回来，人们尚不明事件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开了案件的黑幕。同事们对这种革命阵营内部的残杀都感到无比愤怒，公推董必武去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

董必武经武汉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孙中山早在先一年5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事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董必武遂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申述了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了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申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巴黎和会正在召开。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属战胜者一方，但在和会上却处于被处分的地位。上海街头，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仍在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口；无数忍饥受冻的难民，仍然风餐露宿，流落街头。面对此情此景，董必武心如刀绞，悲愤万分。

三

1919年春，董必武暂住上海期间，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经过几年混战，双方正在上海议和。各省区不少革命党的活动分子云集上海，在上海组织各该省区的善后公会。湖北省善后公会成立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处房子做会址，公推董必武与张国恩主持会务，住在会所。这样就使他得以接触不少革命党人，了解到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给他总结过去革命的教训，寻求新的道路，提供了方便。

“五四”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